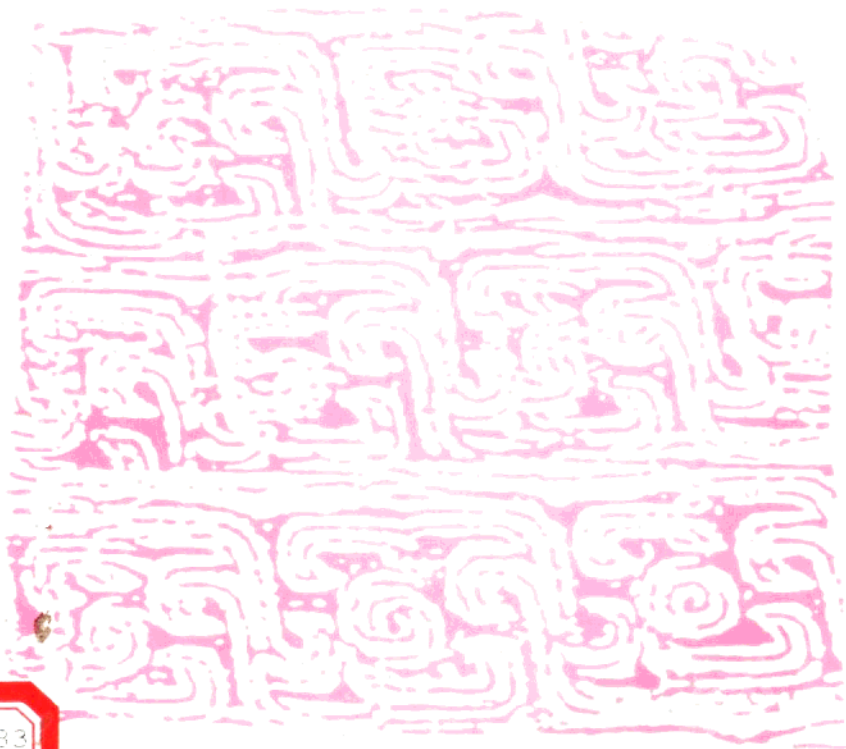


# 东南 考古研究

·第一辑·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编

主编:吴绵吉 吴春明



083

96 厦门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 1 中国东南:早期历史与考古文化(代序) .....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

## 【东南古文化】

- 2 旧石器时代闽台文化关系 ..... 陈存洗(25)  
3 闽南旧石器的发现与研究 ..... 蔡保全(31)  
4 江西万年仙人洞文化的两个问题 ..... 钟礼强(38)  
5 江西新淦出土商代青铜兵器研究 ..... 彭适凡(43)  
6 粤东闽南早期古文化的初步分析 ..... 吴春明(68)  
7 福建几何印纹陶遗存与闽越族 ..... 吴绵吉(82)

## 【东南陶瓷】

- 8 福建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 ..... 罗立华(92)  
9 试论明代德化的白釉瓷器 ..... 叶文程(123)  
10 明清间“漳州窑”的考古新发现 ..... 栗建安(132)  
11 汉唐陶瓷的传出和外销 ..... 唐星煌(137)

## 【其它】

- 12 释陶吴出土铜戈铭文 ..... 施涌云(149)  
13 考古纪原(七则) ..... 黄展岳(162)  
14 再谈山东尚庄遗址的分期、分类与文化关系 ..... 吴诗池(173)  
15 泉州后渚沉船的年代 ..... 辛土成(181)  
16 福建惠安“重建青山庙寝宫记”碑与青山宫始建年代考 ..... 郭志超(183)

- 编后记 ..... (186)

# 中国东南:早期历史与考古文化(代序)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内容提要:**东南地区是我国早期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区系,在分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苗、蛮、百越等早期土著人文的特殊性。在考古学上,以几何印纹陶为核心的土著文化的时空多样性已成共识,因受地理位置的作用,江南平原盆地、沿海山地丘陵、台湾等海岛三大区域间的古文化内涵、发展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构成东南早期古文化的地带性格局。在周邻关系上,与中南的荆楚系统、西南的濮僚系统保持不同程度的文化关系;与黄河流域夏、夷集团的融合逐步加强,构成中华民族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通过向东南亚半岛和群岛的文化传播,成为环西南太平洋的南岛语族土著文化重要源头。

**主题词:**东南 早期 考古

东南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及其以南沿海一带,古曰“扬州”。《禹贡·九州》称“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顾颉刚《禹贡注释》说:“在禹贡里,东南方只到震泽(今太湖)”,“从淮水以南直到东海,跨今苏皖两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河南和湖北的东边一角,唤作扬州。”从九州疆域限于长江、黄河范围看,《禹贡》仅与周代以前华夏族的人文地理知识水平相当,“九州”风土也与考古发掘所见“周汉寒冷期到来之前,即公元前第2000年间中华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相符。<sup>[1]</sup>因此,夏商时的“扬州”还仅包括江淮间的狭小地域。

周代开始,中原华夏族的周边人文地理知识更全面了,“扬州”畛域也扩大到东南全境,“东南”之称始见于《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藪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可见,周初的“扬州”已超出江淮而包括在有“八蛮、七闽”等东南人文地理。《吕氏春秋》曰:“东南为扬州,越也”,“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说明战国以来“东南”、“扬州”、“百越地区”指的已是同一空间位置。所以,后世学者考《禹贡》“扬州”之域,北距淮,缘边与徐、豫界;西缘义阳以东连山,至湖北黄州,包江西与荆为界;南跨岭南,全制交、广,以海为界;东滨海<sup>[2]</sup>,只是两周以来才形成的人文区划格局,与今概念约同。

## 一、生态环境与早期人文的特殊性

### (一) 东南地理生态的特殊性

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四界基本上均有大山、荒漠、海洋与周边地区相对隔离,形成统一、独立的自然地理基础;同时各地生态环境又表现出复杂的分域特点,东西之差、南北之异形成了多层次的自然区划体系。

东部季风区和西部内陆区是我国自然地理的两个最基本区划。东部季风区即通常所说的

“东部”，从东北到岭南，平原、盆地、丘陵、低山相间，受到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季节性影响，气候湿润，森林植被发育，适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古今人文繁荣的主要区域。在这里，南北纬差导致南北地理分域差异，特别是从华北到华南这一我国史前文化繁荣发展、农耕文化最早发生、国家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分别以长江干流和黄河干流为中心，形成南、北方两个主要分域<sup>[3]</sup>。

在地貌上，南方地区以山地、丘陵、盆地、河网和湖泊相间为特点，是我国地表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广布酸性红壤，适合水稻、柑橘、香蕉、荔枝、龙眼、橡胶、咖啡、茶叶等作物生长。北方地区以大面积的平原和高原为主，地表水不足，广布碱性黄土和次生黄土，适于小麦、荞麦、玉米、高粱、谷子、油菜、芝麻、棉花等作物生长。

湿热的亚热带、热带气候是造成南方自然生态特点的主要原因。由于纬度低且濒临东海、南海，各地年平均气温在 16—25 度之间，热量丰富，全年 10 度以上积温为 4500—10000 度以上；降水量最为丰富，年降雨量在 1000—2200 毫米。而北方地区因纬度高，各种气候因素指数明显低于南方，年均温在 8—13 度之间，热量尚足，全年 10 度以上积温为 3200—4500 度，季节差别大，冬季寒冷，夏季炎热，降水不足，全年仅为 600—800 毫米。

南方植被以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季雨林为特点，类型复杂多样，总量丰富，因受地貌、土壤、湿热的气候环境影响，从江淮到岭南由若干渐变的地带性植被群落组成，即江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江南常绿阔叶林、华南沿海季雨林和雨林，在整个南方植被体系中，北部多我国特有的树种，往南多亚洲、特别的热带亚洲、大洋洲成分。与南方这些个递变的地带性常绿林植被景观显著不同，华北地区由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为特点。

在自然地理南、北地带性格局的直接影响下，南方地区形成了适应常绿林和季雨林的“东洋界”森林、灌丛、草地、农田动物群，组成复杂，季节性生态现象不明显。而华北形成了适应针、阔混交的“古北界”森林—森林草原、农田动物群，有明显的冬眠、暖季繁殖、数量优势、换毛等季节性生态规律。南、北物种的区域性差异起源于更新世时期南方的“巨猿—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和北方的“泥河湾—北京人—萨拉乌苏动物群”的差别。

地势、海陆位置差别还造成南方生态自东向西的明显差异，东南部包括了长江下游平原和东南沿海丘陵山地，中部约在长江中游平原一带，西南部则是长江上游、西江上游所在的西南高原。东南地区受海洋环境的明显影响，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往西大陆性气候明显加强，西南高原山地的气候干燥，均温和积温较低，冬夏温差大。低纬、临海的东南地区是我国气候最温暖湿润、野生动植物种群的多度和丰度最高的区域。

汉文史籍从很早起就关注东南生态的特殊性。《后汉书·南蛮列传》载传说时代的南方地区“所处绝险，人迹不至”、“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描述的主要是湿热的东南山地丘陵与北方风土的的巨大差异。《禹贡》记扬州“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也是上古东南热带、亚热带风土物产的写照。《周礼·职方氏》载东南“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吴越春秋·阖闾传》也有“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所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说的都是东南地理生态的特殊性。

## （二）东南早期土著的人文特质

史籍中东南最早的民族是传说时代至夏代的“三苗”。《帝王世纪》载：帝尧时“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战国策·魏策一》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淮南子·坠形训》载：“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骞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可见，说明三苗居洞庭、鄱阳两湖间，属最早的东南民族。

商周时期有“蛮”、“越”、“闽”等。《逸周书·王会解》载：商初“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涿深、九夷、十蛮、越涿”，《周礼》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国，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十蛮、八蛮等都是概称，包括越、涿（瓠）、七闽、吴、粤等见于文献的商周时期各民族，《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也”，《逸周书·王会解》载：“东越海蛤，瓠人蝉蛇”，《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瓠居海中，闽在海中”。徐旭生考蛮、蛮二声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可知夏时的“三苗”到商周时的“十（八）蛮”是华夏对东南人文地理知识扩大的结果。

战国秦汉时代，吴、越、瓠、粤、闽等民族罕见于史籍，而渐为于越、闽越、南越、东瓠（越）、西瓠（越）等不同支系的“百越”文化所取代。如“闽越”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百越”之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即所谓“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我们认为，百越是商周以来吴、越等江浙民族文化的传播并与东南沿海原住闽、粤、瓠等融合形成的新族体<sup>[4]</sup>。

汉代以来，百越文化逐渐融合于汉文化之中，但也有部分越人逃避山里，形成东汉六朝的“山越”。《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在唐宋文献中这部分人被称为“峒蛮”、“峒僚”，就是现今的畲、瑶、黎等少数民族<sup>[5]</sup>。

这些东南早期土著民族在种族、文化上保持相对统一的整体和源流关系，是构成中华民族早期三大集团之一的南蛮民族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拥有共同的图腾祖先“盘瓠”，《后汉书·南蛮传》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号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可见，盘瓠族系的种性、语言与文化都不同于华夏。

总结史籍线索和考古发现，苗、蛮与百越等早期土著的聚落、丧葬、产食、交通、衣饰、语言、器具等人文内涵受东南自然生态的深刻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聚落上，干栏居与洞居共存。东南环境湿热，早期土著的地面建筑以居住面悬空的“干栏式（又称巢居、脚楼）”为特点。《博物志·五方人民》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岭外代答·风土门》载：“深广之民，结棚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棚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乃上古巢居之意也”。《临海水土志》载：“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东南早期土著的干栏建筑遗迹在考古学上屡见不鲜，新石器时代的浙江河姆渡、钱山漾、夏商时期的广东高要茅岗、福建黄瓜山、战国秦汉的福建城村高胡坪等都是，两广汉墓中还随葬“干栏式”陶屋模型<sup>[6]</sup>。东南地理复杂，干栏建筑多见于河流两岸的平地、低谷，而山地丘陵地带的土著多保留更原始的“洞居”形式，如前引盘瓠“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故东南土著又多称“洞蛮”、“洞僚”，《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类……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岭外代答·外国门下》称僚僚“自蛮洞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太平寰宇记》记土僚“江山献峻”“礼异俗殊，以岩穴为居止。”土著洞居遗迹也有不少考古发现，如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广东黄岩洞、独石仔、广西甑皮岩、江西仙人洞、福建南山塔洞等<sup>[7]</sup>。

古人“事死如事生”，东南早期土著民族因居处环境不同而埋葬方式各异，土坑葬、平地葬与崖葬共存。与“干栏”聚落相应的，平地、低谷地带除与南北各地农耕民族相似的竖穴土坑葬式外，还有源远流长的平地葬式。新石器时代的江西拾年山无圻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平地葬式；两周时期吴、越及东南其它地区所见的土墩墓还是不挖墓穴、铺设河卵石床、平地掩埋；到

东周秦汉时期东南百越民族的墓葬仍以墓地铺设河卵石为特点,目的都是为了防潮<sup>[8]</sup>。南方山地南蛮集团民族中常见有崖(洞)葬习俗,史籍记载东南地区普遍有崖葬遗迹,考古调查清理的早期崖葬遗迹有福建武夷山的商周崖葬、江西仙岩的东周崖葬等,其特点是在溪间河谷两岸的悬崖峭壁上的洞罅中安放独木棺,有葬无坟、冢不闭户。南蛮民族的崖葬习俗延续时间很长,张鷟《朝野僉载》说唐代“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龕以葬之,弥高为至孝。”崖葬习俗是南蛮民族洞居历史的一种反映。<sup>[9]</sup>

东南早期土著的产食形态以广谱为特点,稻、薯农作与采集渔猎并重。长江中下游的江湖网地带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近期发掘的距今0.9—1.4万年的江西吊桶环遗址上层孢粉的硅植石分析发现了类似水稻的扇形体,是探索稻作农耕起源的最早线索;罗家角、河姆渡、马家浜等新石器时代前期文化普遍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东南其它区域也全面发现了新石器晚期至商周秦汉的稻谷遗存。<sup>[10]</sup>《周礼·职方氏》说东南扬州“其谷宜稻”,说明这一带是我国主要的产稻区。但将低处水乡地带的水稻栽培等同于东南土著的早期农耕文化是不全面的,薯、芋等类块根植物的栽培应是东南山地土著原始农业的主要内容。《异物志》载:“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南方草木状》载:“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不食五谷,而食甘薯”,被认为与东南土著有族缘关系的南岛语族也主要是栽培块根植物为食的<sup>[11]</sup>。此外,在一些滨河滨海地带,采集捕捞天然食物成为土著先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逸周书·王会解》载:“东越海蛤,欧人蟬蛇,蟬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姊妹珍,且欧文蜃,共人玄贝”,《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水耕而火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自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博物志》载:“东南之人食水产……龟、鳖、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在考古发现上,内陆河畔地区的“螺丝壳堆积”和海滨地区的“贝丘”中含有大量野生介壳类遗存,成为东南沿海早期古文化遗存的一大特色。

东南地区河湖密布、江海相连,早期土著民族善于用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主训术》载:“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淮南子·齐俗训》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说明东南土著善于用舟是一种天性。闽、粤是我国早期航海的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又《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献贡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说明早期的广州、福州已是我国最主要的航海贸易集散地,实与百越及其先民的航海天性有关。早期的舟船遗存也多见于东南考古,如浙江河姆渡的陶塑独木舟,河姆渡、钱山漾等的史前木桨,江苏淹城、福建连江、广东化州等先秦两汉独木舟遗迹等<sup>[12]</sup>。

在装饰内容方面,东南土著的断发文身和树皮草叶麻织最具特色。《淮南子·齐俗训》载:“三苗蛮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剡发……越王勾践剡发文身”,《论衡·书虚篇》记载:“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越,方外之地,剡发文身之民也。”《战国策·赵策二》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瓠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鯁冠秫缝,大吴之国也。”断发即剪发被肩或梳髻,不同于华夏的束发加冠之礼,在东南考古上有不少线索,如江西仙岩东周崖墓的剪发遗存、广西罗泊湾汉墓铜器上的被发与髻发图像、浙江绍兴坡塘M306铜屋中的结发人物塑像等<sup>[13]</sup>。文身雕题即在皮肤上刺纹染色,在海南黎族、台湾高山族等东南土著民族的后裔中仍保留这种习俗。<sup>[14]</sup>东南早期土著的衣饰以树皮草叶织品为特别,前引“盘瓠传说”有“织绩木皮,染以草实”之语,《禹贡》说扬州“岛夷卉服”,顾颉刚注“卉服,孔颖达说即草服,南方居亚热带,岛民以草编织成衣服”,《赤雅·卉服》说“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织其皮者,有勾芒

布、红蕉布、弱锡衣苧麻所为”，近代台湾的高山族仍用椰树皮、芭蕉皮、树叶为服，就是这种文化的残余<sup>[15]</sup>。考古上从我国东南沿海到南太平洋群岛常见的刻槽砺石和圆形石杵就被许多民族学者解释成原始先民的“树皮布打棒”<sup>[16]</sup>。麻织衣饰应是在树皮草叶衣饰的基础上产生的，多见于百越文化阶段，《淮南子》载：“于(干)越生葛稀”，《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福建武夷山和江西仙岩崖葬中都发现了各种麻织品遗存。<sup>[17]</sup>

东南早期土著的语言也不同于华夏系统。前引“盘瓠传说”说蛮夷“语言侏离”；汉代时，《说苑·善说》中楚王母弟听“越人歌”仍需通过翻译，林惠祥考越语为“胶着语”，与今南洋土著“南岛语族”同类，不同于汉人的孤立语<sup>[18]</sup>。近年来，考古发现也提供了越人文字的一些线索，如有学者从东南地区几何印纹陶上的刻划符号、百越铜器和封泥上的“鸟篆”、闽粤等沿海的原始岩刻画中，寻找百越特殊文字的痕迹。<sup>[19]</sup>

东南早期土著的许多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都富有特色，代表性的是有段、有肩石器和几何印纹陶。<sup>[20]</sup>有段石铤、有肩石铤、有肩有段石铤、有肩石斧、有肩石铲相对集中发现于我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址中，在东南亚、南太平洋群岛的土著民族中延续使用很晚，是这一广阔地带早期古文化的重要特征，与主要以长方形常形石斧、石铤、石铲为特点的北方系统原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东南沿海早期土著民族所创造的最具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几何形印纹陶为主流的生活器具，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汉代。印纹陶器表以拍印为主，兼有刻划、戳印、彩绘等手法；主题为几何纹，主要有新石器时代的交叉绳纹、方格纹、梯格纹、席纹、叶脉纹、螺旋纹、平行线纹等，夏商周时代的云雷纹、回纹、斜线三角纹、方格纹、席纹、夔龙纹等，战国秦汉时代的米格纹、方格纹、水波纹、蓖点纹等；一般地，新石器时代主要是泥质和夹砂软陶，夏商周秦汉时期则以泥质灰硬陶和釉陶、原始瓷为特点，少量泥质和夹砂软陶；除太湖至赣鄱流域间因地域较接近黄河中下游文化区有不少三足、袋类器外，东南沿海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主要以圈(凹)底和圈足为特点。该文化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和东南亚一带，明显有异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以素面和绳纹灰陶为主、以三足器和袋类器为特点的器物群。几何印纹陶文化成为东南早期土著区别于其它区域民族文化、区分东南土著内部不同族群和阶段文化的主要考古标志。

可见，在特殊生态环境的制约下，东南土著人文与华夏内容差别很大，是中华文化统一体形成之前多元格局中相对独立的单元。从考古学上看，以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核心的早期古文化是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特殊而重要一环。

## 二、以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核心的早期土著文化的地带性格局

东南早期古文化相对独立于华夏文化之外，但内部又有诸多时空差异，这一多样而统一的文化格局在几何印纹陶遗存中表现得最突出。

1914年广东南海南越文王墓的发掘出土首批引人注目的印纹陶资料；20—30年代国内外的许多考古学者、传教士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如林惠祥和英国人芬戴礼在香港南丫岛调查双“F”纹或蛟龙纹印陶遗存；意大利人麦兆汉在海丰调查印纹陶遗存；1929年和1935年林惠祥两次调查台湾圆山贝冢，并结合他所调查的高山族民族志写成著名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1930年代卫聚贤等先后调查南京栖霞山、常州淹城、金山戚家墩等含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古遗址；1937年施昕调查并发掘杭州良渚；同年林惠祥调查、发掘了闽西武平的小径背等遗址，获得典型石铤、有段石铤、印纹陶等重要内涵。这些以印纹陶、

有段石镞等为特点的早期古文化遗存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初步注意。30年代前后不少学者就提出了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相对独立的问题,如陈公哲比较香港印纹陶和江、浙的史前遗物后提出“两者古时文化原属同系”的看法;鹿野忠雄、金关丈夫等依据闽、台两地相似的古文化内涵提出两岸早期文化密切相关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林惠祥于1937年在“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上宣读的武平研究报告,提出“武平式”史前文化所代表的“亚洲东南海岸地带”文化不同于华北的看法,成为他后来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上“东南区”概念的基础。<sup>[21]</sup>但限于当时条件,这些考古工作都缺乏可靠的地层资料,许多学者虽已注意到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的区域特点,但都只是零星和模糊的感觉,缺乏对区域文化产生、发展过程的系统认识。

1954年夏鼐先生将“出几何印纹硬陶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省区作为我国古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来认识;<sup>[22]</sup>当时“硬陶文化”、“印纹陶文化”、“印纹硬陶文化”、“几何印纹硬陶文化”等在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述中相继被用来概括、甚至等同于这一区域的早期古文化。曾昭燏、尹焕章先生提出以“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福建县石山遗址来命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文化”,称“县石山文化”<sup>[23]</sup>。林惠祥先生等还在前引“武平式”史前文化的基础上,先后论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以有段石镞和印纹陶为特征的“东南区”是一个独立文化系统的看法,并提出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创造者是古代“百越”民族及其先民,初步确立了东南民族历史文化区的轮廓。<sup>[24]</sup>然而,50—60年代的工作还是以较多的调查和一些不很严格的发掘资料为基础的,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印纹陶和有段石镞等内涵为代表的东南区域古文化内部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实际上是由不同考古学文化组成、由不同族群创造的一个地域文化传统,但因缺乏可靠和代表性的地层、成组单位资料而不能区分。象县石山的最初几次发掘都因缺乏严格的地层划分而没能将延续1—2千年的包括多种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内涵区分开来,因而也是无法代表东南区范围所有印纹陶文化的。

70年代以来,东南各省区的考古工作者集中精力开展本地区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地层单位,为揭示东南区内部早期古文化的分域、分阶段特点奠定了基础。依据典型遗址的发掘资料,各地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命名,基本上明确了东南区早期古文化的多样性格局,并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发展过程与序列。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土墩墓文化等基本构成了这一分域古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石峡中层类型及夔纹陶类型、米纹陶类型的提出,也使岭南早期古文化的地域性和发展过程初步明确;赣鄱流域的仙人洞文化、山背文化、樊城堆文化、吴城文化、万年类型,闽江流域的县石山文化、黄土仑类型,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等,初步明确了这些地区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内涵特点和发展线索。<sup>[25]</sup>

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以分析考古学文化间相互关系为基础、进而探讨我国早期古文化的区系结构即谱系成为我国考古学综合研究的主要课题。1978年“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讨论了先秦两汉时期东南地区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内涵、分布与年代,及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早期古文化的分区、分期与文化关系等问题<sup>[26]</sup>。1981年,李伯谦先生发表著名的《我国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一文,系统地总结了印纹陶文化的不同时空内涵与特点,提出宁镇皖南区、太湖杭州湾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粤东南闽南区是印纹陶文化的七个基本区系,成为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成果。<sup>[27]</sup>

总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特别是解放后40年的考古工作,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东



南地区早期古文化多样一体的谱系格局已基本理清。

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为以前述印纹陶文化的时空差异为代表的若干分区,还表现为受地理环境与地理位置差异的制约,新石器、青铜时代前后的考古文化在内涵构成与发展进程等方面出现三个明显的地带性差异,地带性格局是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发展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根本特点。

#### (一) 长江下游的平原盆地地带

以太湖、鄱阳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平原、盆地,是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发展的第一地带。因毗连黄河中下游文化区,在土著文化内涵中共出较多的北方文化因素;在社会进程方面,这里是东南区早期古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龙头地带,于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相继创造了发展水平很高的稻作农耕文化、早期国家文明和发达的青铜文化。该地带文化由太湖流域、宁绍平原、赣鄱流域等几个分区构成。

1. 早期古文化的区系结构。在太湖流域,早期古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罗家角下层类型、马家浜类型、松泽类型、良渚文化,青铜时代的马桥文化、土墩墓文化及早期铁器时代的金山文化。紧邻的宁镇地区以北阴营下层的一至四期为代表的文化,皖南地区以薛家岗下层的一至四期为代表的文化,分别与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四个文化类型年代对应、内涵相似而又各自保留一些地方特色;青铜文化可分成湖熟文化前期与土墩墓文化两类,也分别与太湖流域的青铜文化相似和相同。<sup>[28]</sup>

在宁绍平原及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有一脉相承的河姆渡文化一至四期,并发展为本地区的良渚文化,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有高祭台类型、土墩墓文化、金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原始文化相同步。<sup>[29]</sup>

赣鄱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由早期的仙人洞文化、中期的拾年山下层、郑家坳墓葬、晚期的山背—樊城堆文化、社山头上层类型等阶段构成,距今约8—9000年至3500左右,下限较太湖、宁绍平原地区略晚。青铜文化有商代的吴城文化及万年类型,两周时代的神墩类型、磨盘墩类型、仙岩类型。<sup>[30]</sup>

2. 土著与外来文化因素在时空上的演变。苏南浙北与北方文化区在地理上直接接触,是东南古文化体系中受来自黄河流域古代文化影响最多的地区。宏观考察东南区的早期古文化,可发现苏南浙北这一北部边缘地带的新石器文化明显表现为二类因素的组合,即土著的圜底器、圈足器类和主要来自黄河文化影响的三足器、袋类器类。罗家角、马家浜、松泽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腰沿或多角沿的圜底釜,圜底和小平底的罐、钵、盘、壶,喇叭形和塔形圈足豆,矮圈足或花瓣圈足壶、杯,及支座等,这一套器物基本上代表苏南浙北一带先龙山时期的土著文化内涵。相比之下,三足器、袋类器等来自以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文化传统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即三足、袋类器的种类数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增加,同期文化中北部的三足、袋类器的种类数量明显比南部多。罗家角、马家浜类型仅见少量扁凿足的釜形鼎,松泽类型阶段的鼎形式增多,有凿形、侧扁形、马背铸形等式足的釜、罐、盆形鼎,应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产物;偏北的北阴营文化中可看到这类影响的更直接的证据,如鬼脸式足鼎、实足鬻等;同样性质的还有类似于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也多见于北阴营文化和松泽类型之中。而在往南的河姆渡文化一至四期中,以圜底、小平底和支座为代表的器物群特征非常显著,三足器类始终很少见。到了良渚文化阶段太湖流域圈足器和三足器才同样发达,圜底器少了,大圈足或矮圈足的壶、罐、簋、大盆等器类明显可从松泽类型土著组合中找到渊源;鼎的形式更多,当然并非都是直接从典型龙山文化传过来的,如鱼鳍形足等就是松泽阶

段扁侧式足的发展,说明前一阶段的外来文化已经在这一地区发展出地方变种;但磨光黑陶、袋足鬻等的普遍出现则是典型龙山直接影响的产物。但是,在良渚文化南部边缘类型如近年发现的奉化名山后遗存,这类来自北方的文化影响要弱得多,与鱼鳍形、锥形足鼎共出的仍是较多的圜底、小平底的釜、罐器类和高、矮圈足类。<sup>[31]</sup>

赣鄱流域与浙、皖地域相连,新石器文化内涵二类组合的构成与苏南浙北地区相似。仙人洞、拾年山一期阶段,圜底、平底的釜、罐、钵等是基本器类,不见三足器。拾年山二期、郑家坳阶段,与圜底釜、罐、钵、喇叭形和塔形圈足豆、矮圈足簋、壶等共出的有较多的侧扁足、管足、锥足的釜形、罐形、钵形鼎及实足鬻,三足器突发式的出现与经苏、皖南下的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有关,但这种外来影响与土著文化有机结合,如鼎多在土著的圜底器上加三足,并出现本地区仅有的管状足这种三足变种。山背、樊城堆等晚期阶段,外来因素又有发展,鼎足新见丁字形、鱼鳍形、瓦状形等,并出现袋足鬻、盃等;同时,山背类型中有许多近似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说明赣鄱流域古代文化的内涵较之江、浙地区更复杂。

青铜时代,这一平原盆地地带诸类型文化均属于印纹陶文化体系,但也受到商周青铜文化更明显的影响。在夏商时期,湖熟文化前期中与小平底或圜底瓮、罐、尊、盆、钵、圈足豆、簋等共出的有大量矮足罐形鼎、袋足鬻、鬲等明显属于夏商文化的因素;马桥文化、高祭台类型均流行圜底、圜凹底、小平底的釜、钵、罐、孟、碗、杯、双腹甗形器和圈足的豆、簋、壶、尊等,共出釜形鼎及少量袋足盃、鬻,不见鬲类器。可见因地域关系,以袋足鬻、鬲、盃等为代表的夏商文化因素对苏南浙北地带的的影响也是由北往南逐渐减弱的。在赣鄱流域,吴城文化也明显表现为土著和外来两组因素组合,土著因素以圜底、圜凹底、小平底、圈足为代表,主要器类为釜、各式罐、瓮、孟、钵、甗形器、豆等;外来因素主要是以袋足鬲、甗、三足罍、大口尊、假腹豆、长腹罐等陶器及鼎、斝、甗、刀、戈等青铜礼、兵器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吴城文化的土著因素是文化的主体,但青铜器的内涵主要属于商文化的范畴,新近发现的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内涵也有相似的情况<sup>[32]</sup>。到了两周时期,平原盆地地带的青铜文化渐趋统一,土墩墓文化基本覆盖了苏皖南、浙江、赣东北地区。该文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葬俗,几何印纹陶、釉陶系的罐、坛、甗、釜和釉陶系的豆、碗、盆、盘代表土著文化的主流;绳纹陶系的鼎及袋足鬲、甗和青铜鼎、鬲、簋、尊、卣、盘等礼器则代表了来自北方周文化的影响。赣鄱流域的神墩、磨盘墩类型也表现出类似的二分组合,以几何印纹陶和釉陶系的甗形器、釜、罐、豆、簋、孟等土著器物,与袋足鬲、甗、高领尊及成套青铜礼、兵器为代表的商周文化因素共出,两类文化的许多器物实际上与土墩墓文化内涵相当一致。

早期铁器时代是该地带文化受楚、汉文化更全面的影响、土著文化逐步融合于汉文化中的重要转折点。东周秦汉时期的江浙地区的金山文化延续土墩墓文化发展下来,该文化前期的典型单位上海金山戚家墩下层、马桥上层,以印纹陶坛、罐、盂及原始瓷碗、杯等为代表的土著文化仍为主流;晚期的典型单位浙江绍兴漓渚、凤凰山墓地中,原始瓷和印纹陶明显减少,以仿铜的釉陶鼎、盒、壶为代表的汉式器物渐为主流<sup>[33]</sup>。赣鄱流域东周时期的仙岩类型中,与印纹陶遗存共出的也有为数不少的仿铜素面陶鼎、提梁盃等楚、汉文化器物。

3. 东南古文化发展的龙头地带。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所在的苏南浙北一片早期古文化间的差别不太大,分别是先秦时期吴、越土著及其先民所创造,这里的古代文化同步发展,内涵比较一致。赣鄱流域的古代文化与苏南浙北间的差别多一些,是东南历史文化区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区,可能就是古代“三苗”、“干越”创造的文化。苏南浙北到赣鄱流域先秦古文化的社会进程在东南土著文化体系中处于龙头位置,发展水平最高。罗家角类型、马家浜文化、河姆

渡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阶段,产生了比较成熟的稻作农耕,仙人洞也有稻作活动的萌芽,是东南区农耕文化最先发育地,也是我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在良渚文化阶段,苏南浙北地区发现了一批大型玉殓葬及以大型祭坛遗迹为中心的密集的聚落群址,表明一种初期国家或原始方国性质的复杂社会组织已经形成,是东南地区率先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地带,也是我国龙山时代国家文明起源的几个中心地区之一<sup>[34]</sup>。青铜文化的产生、发展与黄河区基本同步,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前期)已经出现少量小件青铜器,大洋洲地点及吴城文化处于该地带古代青铜文化的颠峰,两周时代的青铜文化更持续发展,并直接推动闽、粤等第二地带青铜文化的发展,可以说这一地带同样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

可见,江南平原盆地地带的早期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来自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一个自北而南逐步加强的时空轨迹,但始终保持全面和持续的过程,直到东周秦汉以后的土著文化逐步统一于楚、汉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中。早期古文化的发展进程虽略有差异,但与中华早期文化中心区的黄河中下游基本同步。而在东南的沿海丘陵山地和海岛地带,情形就不同了。

## (二) 沿海丘陵山地地带

以珠江、闽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桂、琼及浙南沿海,地处武夷—南岭以东以南的丘陵山地,是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发展的第二地带。这里远离中原文明区,更因武夷—南岭山地的阻隔而较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早期古文化表现出更强烈的地域性,是东南古文化土著内涵发育和顽强延续的核心地带;特殊的自然环境制约农耕形态的发展水平,采集、狩猎形态在早期古文化的发展进程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远落后于第一文化地带。该地带由闽江流域、粤东闽南、珠江流域等几个分区构成。

1. 早期古文化的时空结构。闽江流域新石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经历了先龙山时代的壳丘头类型、县石山下层类型(下游),龙山时代的县石山中层类型(下游)和牛鼻山类型(上游),夏商时期的县石山上层类型、黄土仑类型(下游)和马岭类型、白主段类型(上游),两周时代的铁山类型,战国秦汉时代的庄边山类型、富林岗类型和凤林山类型。<sup>[35]</sup>

珠江流域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的阶段类型有先龙山时代北江流域的黄岩洞类型、石峡早期类型,三角洲地区的金兰寺下层文化;龙山至夏商时代北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石峡中层类型,三角洲地区的河宕与金兰寺中层类型;两周时期为基本统一的夔纹陶类型或称石峡上层类型。战国至汉初的米纹陶类型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sup>[36]</sup>

西江流域的广西,早期古文化形态比较多样,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依聚落形态分类,有甌皮岩式洞穴文化,西津式河旁贝丘文化,大龙潭式山坡文化;在发展序列上可分为,早期的甌皮岩—豹子头类型,中期的亚菩山—五马山类型,晚期的独料—大龙潭类型,青铜文化可依广东的夔纹陶、米纹陶两个阶段予以衡量。<sup>[37]</sup>

经初步分类,晋江、九龙江、韩江流域所在的粤东闽南地区的早期古文化包括了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石尾山—富国墩式、陈桥—腊洲山式两个阶段类型,新石器时代晚期为龙山时代的左宜恭山—大帽山类型,新石器末期为夏商之间的虎头埔—蚁山类型;青铜文化分成西周前后的浮滨类型,东周秦汉初的头岭—犁头山类型两个阶段。<sup>[38]</sup>

2. 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的顽强维持。该地带内的各区系文化因远离中原历史文化区,更由于武夷、南岭山脉所形成的天然阻隔,北方系统的文化影响很难介入。较之前述长江下游的平原盆地地带,东南沿海丘陵山地地带新石器文化的地域性传统更顽强延续。在闽江流域为中心的浙南闽东北一带,早期古文化发展的中心是闽江下游河谷,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过程

中也有个别外来因素,如昙石山中层、昙石山上层、黄土仑类型中的彩绘、拍印、刻划仿铜纹样等,应分别与来自北方龙山文化及夏、商青铜文化的影响有关,但这类因素是有限的;在本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内涵体系中,以圜底、圈足类的宽沿束颈釜或甗形器、罐、尊、直颈壶及簋、杯、豆等为基本组合的土著器群延续发展,基本缺乏三足、袋足器类,于昙石山中层仅见的鼎也体现为典型的地域性釜加三柱足的融合形式。闽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主体内涵与闽江下游基本一致,但在不同发展阶段有较之下游地区更多的境外文化因素的介入,如龙山时代出现较多三足器,甚至少量袋足鬲,这正与该地域所在的武夷山地处于东南沿海地带与东南第一地带交接点的地理位置有关,但置于东南全境宏观考察,这类影响的规模、强度显然不可与第一地带相比。

珠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发展格局与闽江流域相似,土著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沿海,新石器时代的金兰寺下、中层及近年来发现的更早些的后沙湾下层、草塘湾下层<sup>[39]</sup>,陶器的基本组合为圜底的釜、罐、钵、圈足的盘、豆及器座等,现有报道中这一地域尚无鼎等三足器资料,这一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晚期。北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内涵组合中,在新石器早中期阶段的青塘洞、石峡下层早期文化层等单位中,陶器组合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致,表现为圜底与圈足的传统和缺乏三足器的特点,说明这一阶段岭南地区原始文化的统一性。石峡文化(下层墓葬)阶段形势有所变化,该器群由两类因素交融组合成,一类仍以圜底釜、罐及圈足盘、豆类器为代表,是岭南上著原始文化的延续;另一类以盘形、盆形、釜形鼎、三足盘、鬲等为代表的三足、袋足器群与岭北赣鄱流域的筑卫城、樊城堆文化同类器基本无异,是龙山时代北方文化通过第一地带影响第二地带的考古反映,也与北江流域地处南岭山地这一沿海地带与东南第一地带交接点的地理位置有关。石峡中层类型阶段,下层中以各类三足、袋足器为代表的外来因素没有延续下来,很容易形成石峡文化到石峡中层间文化断层的假象,实际上以圜(凹)底和圈足的罐、尊、釜、豆、盘及器座为组合的中层内涵仍然是岭南沿海土著原始文化的延续发展。换言之,在石峡下层早期类型、石峡文化、石峡中层类型构成的新石器文化体系中,土著文化仍然是一脉相承地发展的,石峡文化中的外来因素虽然增加了这一时期古文化面貌的复杂性,但并没有造成深刻的影响。正如严文明先生所指出的:粤北的石峡文化同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关系太密切了,在广东的分布并不广泛,似乎不能成为广东青铜文化的主要基础,<sup>[40]</sup>他的话在粤、闽为中心的第三地带龙山时代文化格局上有着普遍意义。

晋江、韩江流域间的粤东闽南地区和西江流域上的新石器文化反映在考古文化格局上也有同样的特点,即沿海一侧的土著文化特点非常鲜明,受到北方地区早期文化的影响不太明显;靠近武夷—南岭这一东南地区两个文化地带交界处的西、北一侧的古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受到北方地区和太湖、赣鄱地带古文化的一些影响,主要表现在龙山时期出现一些三足器和袋类器上。

总之,在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总体框架中,东南沿海丘陵山地地带所受到的黄河系统的文化影响较之江南平原盆地地带要微弱得多,且多不成体系,没能出现全面影响的规模;在该地带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这一外来文化的影响总是短暂的,没能延续和逐步加强,即便是闽江上游、北江流域和韩江上游这个处于第一、第二地带交接点上曾经较多的龙山式的三足、袋足器因素在接下来的夏商时代反而消失了,说明沿海山地地带的土著传统较之江南平原盆地要顽强得多。

3. 两周秦汉时代古文化的变动。两周以后,该地带早期古文化才开始较多接受境外青铜文化的影响,古文化的内涵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闽江流域,上下游文化基本统一,铁山

类型中出现了不少类似于江浙土墩墓的文化因素,如石圻、石床墓,席纹硬陶瓮、罐、钵,釉陶碗、豆,吴越式青铜剑、矛、戈、斧、铙等;但新石器以来的许多土著因素还持续,如甗形器、单鬲壶、直颈壶等,青铜斧、矛、戈还有镞形、人形饰等地方色彩。就是说,两周时期闽江流域出现了外来吴越文化与土著文化全面融合的局面,这是东南区内部两个地带的土著因素之间的融合,闽江流域两周时期遗存中仍无一件袋足器,极少三足器,直接来自中原两周文明区的文化影响微乎其微。战国秦汉以后,以楚、汉文化为代表的东南区以外的古文化才逐步传入,如庄边山类型鼎、豆、壶组合,并开始新一轮全面融合,反映在从富林岗到凤林山两类型上的汉文化因素递增、闽越文化因素递减之势,并成为六朝以后闽江流域早期古文化统一于汉文化体系的基础。<sup>[41]</sup>

在珠江流域,以夔纹陶为特点的青铜文化就是在土著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境外青铜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如石峡上层的釉陶豆、钵与青铜矛、钺、匕首等就与吴越地区所见无异,信宜和罗定的兽足铜盃、惠阳的兽足铜鼎、惠来的铜钟等与商周文化类似;但以夔纹陶器群为代表的土著因素仍是古文化的主流,清远的人头柱形器、香港和曲江的饰人头像的匕等青铜器也很有地方特色。<sup>[42]</sup>在米纹陶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更大量出现,以广州汉墓D类器(仿铜陶鼎、豆、壶等礼器)、肇庆、清远、四会等地的壘、提梁壶、盃等铜礼器及剑、戈、矛、锤等铜兵、工具为代表的内涵分别与中原和楚地文化相类似;在广州汉墓中,以米纹、方格纹陶器群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在该文化前期仍是主流,但东汉以后渐趋衰弱,为以D类器为代表的汉文化所取代。<sup>[43]</sup>

处于上述两个流域之间的粤东闽南地区,浮滨类型的青铜器多为商周器类,但造型、装饰上的地域特点如凹弧刃铙、有段铜铙、兽目与几何纹饰等,更明显的陶器群特点,同样显示出土著与外来文化融合之势;除商周文化外,还见釉陶碗、豆和青铜剑、矛等与土墩墓文化类似的元素,及来自珠江流域的夔纹陶因素。在东周秦汉时期,头岭—犁头山类型是一种类似于岭南米纹陶类型的土著印纹陶文化,共出东周秦汉式青铜剑、矛等兵器。但尚未见其它区域常见的东周秦汉铁器和以礼器鼎、豆、壶组合的楚、汉因素。

可见两周秦汉时代,东南沿海丘陵山地的土著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全面阻挡之势才开始逐步改变,两周时期既有以吴越土墩墓文化为代表的来自东南区域内部第一地带的文化影响,又有来自东南地区之外的周、楚文化的影响,这些都促成该地带青铜时代的到来。战国秦汉前后开始受到东南区域以外的楚、汉文化较全面、直接影响,正是这一影响促成该地带土著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

4. 古文化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较之前述江南平原盆地地带和黄河中、下游历史文化区,东南沿海丘陵山地地带各区系间早期古文化的发展表现为基本同步的阶段性滞后。在新石器时代,主要聚落形态有沿海和河口的贝丘、内河台地、内陆山坡与洞穴等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沿海的贝丘和内陆的洞穴、山坡遗址中出现农耕文化的证据还不明显;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闽江下游、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等贝丘、沙丘遗址相对集中的文化区,以昙石山三层、金兰寺中下层、西津文化等为例,以采集、捕捞水生贝类、鱼类为食的生产方式在很长时期内是人群生活的主要来源;即便在闽江上游、北江等西、北部一侧的小片河谷盆地,以牛鼻山类型、马岭类型及石峡文化、石峡中层类型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中,虽以大型石斧、穿孔石斧、石铙、穿孔石刀等为特点的农耕工具明显多于沿海一侧,表明这些适于农耕的有限地带的农耕生产活动比较发达,但也远不及江南的平原盆地地带。沿海山地丘陵地带原始文化中生产经济长期滞后是根植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的,前文述温暖、潮湿的东南沿海热带亚热带丘陵山地动植物

种群多、规模大,为原始人类采集狩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物,生产活动显得不那么迫切,延缓和制约了农耕、畜养等生产性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以采集渔猎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更缺乏比较复杂的如第一地带中良渚式的聚落结构所指示的早期文明产生的迹象。

东南沿海地带青铜文化的产生也晚于长江、黄河流域,发展水平也远落后于后者。闽江流域最早的青铜器出于两周时代的铁山类型中;珠江流域夏商期的石峡中层、河宕、金兰寺中层里不见青铜器,零星铜器也没有早过周代特点的;在粤东闽南,虽然浮滨类型中的部分青铜器具有商代特点,但该类型共存物的主体年代也在西周前后。在整个武夷—南岭以东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带,虽然县石山上层类型、黄土仑类型、石峡中层类型等夏商两代典型地层的印纹硬陶器中有大量的云雷纹等仿铜纹样,但考古学资料所能证明的该地带全面跨入青铜文化门坎的年代是西周,且青铜文化的内涵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贫乏,长期处于不发达的青铜文化阶段。伴随着青铜文化发展的步伐,两周时代,福建南安大盈西周墓、广东肇庆、四会等地的战国墓分别随葬包括青铜鼎、钟、壶、盃、罍等礼乐器及戈、矛、戚、钺等兵器在内的青铜器,<sup>[41]</sup>代表了一种较复杂的社会形态的发育,应就是秦汉闽越、南越等王国社会的前身,但这一文明因素的出现比较太湖、鄱阳湖流域龙山时代到商代间国家文明社会的成熟发展要晚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战国秦汉时代,在楚、汉文化对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的全面融合之势中,东南沿海丘陵山地带与江南平原盆地地带古文化发展进程的差距才逐步缩短。

### (三) 海岛地带

台湾及附近岛屿地带是东南早期古文化发展的第三地带,该地带与沿海丘陵山地带隔海相望,自然背景也大体相仿,因而从现有材料看两个地带间的早期古文化内涵存在相当的共性。但该地带远在中原早期古文化影响力的辐射范围之外,古文化长期停滞,发展水平明显低于第一、二地带。

台湾的史前文化发展的中心在西海岸,新石器时代大体经历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早段为大坌坑文化。中段的三个分区类型为北部的芝山岩文化,中部的牛骂头文化,南部的凤鼻头文化红陶层。晚段有北部的圆山文化,中部的营埔文化,南部的凤鼻头文化灰黑陶层。紧接这些新石器文化之后是铁器时代的十三行文化、番仔园文化、莺崧文化等区域类型。<sup>[45]</sup>

台湾岛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带、特别是闽粤沿海的早期古文化有着非常一致的共性,但又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迟滞。前陶期的长滨文化属于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的砾石砍砸器—刮削器文化传统,但长滨文化延续发展至约距今 5000—6000 年左右的全新世中期;即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繁荣期,台湾的史前史仍处于陶器和磨光石器发生前的旧石器文化残存阶段。大坌坑的绳纹陶文化是台湾已知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该文化陶器器表装饰粗绳纹、刻划纹、戳印纹、指甲纹,主要器型为圜底的高领罐、钵等,不见三足器,高岭罐颈部带突脊一周,与前述第二地带新石器文化发展早期阶段的黄岩洞、甌皮岩、石尾山—富国墩遗存非常相似,发展阶段相当,与壳丘头、县石山下层类型的突脊颈罐等器类也相近;但现有大坌坑文化上限资料没有超过 5000 年者,且延续发展下限至距今 4000 年左右,较大陆东南沿海同一阶段的古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迟滞约 2000—5000 年。芝山岩、牛骂头和凤鼻头红陶层等中期文化分别与石峡下层早期类型、金兰寺下层类型、县石山下层类型等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中期阶段内涵相似,特别是磨光红陶、细绳纹陶、几何形纹红彩陶和束颈圜底罐、釜、直颈圈足壶等代表性特点非常一致,但台湾西海岸的这些史前文化类型与大致处于距今 3000—4000 年间的夏商时期,比较大陆东南沿海的同阶段红陶文化的发展晚约 2000—3000 年。圆山、营埔、凤鼻头灰

黑陶层等新石器文化晚期阶段诸类型与东南沿海的河宕、石峡、县石山中层等龙山时代以灰黑陶为特点的文化相似，发展阶段也应相当，但这些仍处于新石器文化晚期阶段的台湾史前文化距今约 2000—3000 年之间，约当两周时期，较之闽、粤等大陆东南沿海的古代历史进程也落后 1000 多年。约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在东南地区文化统一进程的加快，铁器也传入到台湾，但影响并不深刻，台湾民族文化的主体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仍是土著高山族文化，从延续到很晚近时期的高山族原始制陶的文化内涵看，其与先秦时期闽、粤、台地区以几何印纹陶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一脉相承。<sup>[46]</sup>随着明清以后汉文化的大量移入，台湾历史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局面才有所改变。

东南早期古文化内部所表现的三个明显的地带性差异，也在华夏民族对东南人文的不同认识中体现出来。前引在传说时代前后，东南民族中只有洞庭、鄱阳间的“三苗”为华夏文化所知，夏商时代的“扬州”域还限于东南的平原盆地一块，“三苗”和夏商“扬州”地域正是东南土著文化发展的第一地带，发展水平最高、与华夏关系最近，故最先出现于汉文史籍。而苗蛮集团其他成员活动的更广阔的东南沿海山地、丘陵、海岛地带则远为华夏民族所未及。周秦时期，随着百越文化的逐渐形成，土著民族文化的条块布局更加明确，《越绝书·越绝外传》载：“阖闾欲东并大越”；秦始皇三十七年“因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又“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山）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大越为无余初封地，在山阴；外越在东海外；蒙文通考大越山阴即浙江绍兴，外越当为台湾，<sup>[47]</sup>如是推测内越在吴越以外、台湾以内的闽、粤地则不致大错。就是说在百越文化中，靠近北部、发展水平较高并至迟在商周时代已建立国家文明的江浙一带的吴、越称“大越”，以南的东瓯、闽越、南越等东南大陆沿海则为“内越”，而大陆以外的海上则为“外越”，与东南古文化的地带格局相吻合。

早期古文化的地带性格局与东南地理因南北纬度差、地貌分布和海陆位置不同等综合制约所形成的内部自然生态条块分域密切相关。首先，主要地貌单元呈大约北东—南西方向平行排列，并具有深刻的地质构造背景，以武夷—南岭为主干的东南沿海山地和包括台湾在内的西北环太平洋岛弧这二个构造隆起带，自新生代以来处于不断隆起状态；其间是包括赣鄱平原、长江三角在内的长江中下游拗陷带，和包括浙、闽、粤沿海及相连的东海、台湾海峡在内的东南沿海平原、陆缘海域拗陷带。两列隆起和两列拗陷基本平行，造成了东南陆区地形、地貌的三列小分域，即内列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丘陵，中列的东南山地与沿海平原、丘陵，外列的台湾等海岛地带；同时又将东南河流水系割成三大体系，即长江中下游流域，钱塘江、瓯江、闽江、九龙江、韩江、珠江等东南沿海诸河流域，台湾等岛屿水系。其次，因纬度差别，区域气候从北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向边缘热带的海南岛渐变；但又受到地形格局和海陆位置的影响，东部沿海近岸地带受海洋季风的强烈影响，特别是武夷—南岭隆起带的两侧的气候差别更明显，使得我国东南气候带沿海一侧明显北移，气候分域为大致北东—南西的三列平行地带。内列是包括鄱阳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属于北亚热带，10 度积温 2500—4800 度，降水量 1000 毫米以上，东部三角洲可达 1500 毫米，植被以常绿和落叶混交的阔叶林为特点；中列是沿海山地、丘陵地区，属中南亚热带，10 度积温达 6400—8000 度，降水量 1600—2000 毫米，以常绿阔叶林为特点；外列是沿海平原、岛屿，属于边缘热带、中热带，10 度积温 8000—10000 度，降水量达 1400—2400 毫米，以热带雨林为特点。地貌与气候植被的差别是造成早期土著先民不同人文内涵的基础，江河水系是土著文化分群发展的客观背景，山地阻隔又是土著

传统延续和文化排他的重要原因。东南地区生态地理诸因素呈大致相同的北东—南西向条块分域,而东南地区早期土著文化的三个地带性分布格局与之基本重叠,可见东南文化受地理环境制约的程度是很深刻的。

### 三、东南古文化的周邻关系

作为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之前早期古文化多元格局的一支,东南土著民族与周邻地区的早期民族间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文化关系。从汉文史籍和考古发现看,与南方荆楚和濮僚系统、与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与海外南岛语系民族集团的人文关系是东南土著民族周邻关系的最主要方面。

#### (一) 东南土著与中、西南荆楚、濮僚系统民族文化的关系

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阔地域的南方早期土著民族谱系繁多,一般认为居东南、中南、西南三地,约分别相当上古“九州”的“扬”、“荆”、“梁”,活跃着三大民族体系,即百越、荆楚、濮僚及其先民。东南百越及其先民分别与荆楚、濮僚系统民族群体间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关系。

1. 与荆楚系统的文化关系。早在传说时代前后,南方诸民族间已有明确的地域界线,《淮南子·坠形训》载:“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骞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除东南的“三苗”外,居中的有“骞头”,《尚书·尧典》、《孟子·万章》有“放骞头于崇山”之语,徐旭生先生指出这是舜、禹南征三苗时,骞头居于两湖西部山地的情形,俞伟超先生考崇山在临澧县和澧县以西山地并推为“先楚”文化。<sup>[48]</sup>商代“荆楚”于此间兴起,《诗经·商颂》说:“挾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并逐步强大,直到秦统一。

东南百越系统与中南荆楚系统的文化关系是南方民族史的一件大案。一说两者大异,《荀子·昔唇》载:“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儒效》载:“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另一说两者同祖、同姓“芊”、皆属苗蛮集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颛项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颛项生骞头,骞生苗民”,《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引《正义》载:“越,芊姓也,与楚同祖”,《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项高阳……芊姓,楚其后也”,又《国语·晋语八》曰:“楚为荆蛮”。<sup>[49]</sup>

从考古学看,百越与荆楚是两个系统的文化,大异小同,互有交融。百越系统文化以发展过程中的印纹陶为特征,荆楚系统文化则与华夏素面、绳纹灰陶系统大同。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一脉相承,作为荆楚先民文化的考古学遗存,内涵、器物组合与东南地区同期文化的差别明显。<sup>[50]</sup>但由于自然环境的某些类似,与东南地区共同成为我国稻作农耕文化发源和发达的地区;陶器类别上,表现为圈足器特别发达、三足器逐步发展的传统,这与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所相似;而象山背文化中的屈家岭文化因素、珠江三角洲早期沙丘遗存中的刻印和彩绘陶盘等类似于大溪文化的因素,<sup>[51]</sup>则说明两地新石器文化已经有所交流。

夏商周时期,东南各地逐渐形成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点的考古文化体系,而荆楚民族则形成了一种素面和绳纹的软陶、类似于夏商周文化的鬲、豆、盆、鼎、罐组合的文化。虽主要在湘东、南的一些地方,如石门皂市下层、平江舵上坪上层也发现一些印纹陶,但鬲、假腹豆、尊等器形与东南系统截然不同,因而只是受到东南古文化影响所致,而不能看成文化上的统一。约从东周时期起,楚、越考古文化的差别更是一目了然,楚墓所出的素面和彩绘陶系的仿铜陶鼎、敦、壶等礼器组合应是周代礼制在楚地的体现,与百越文化代表性的印纹硬陶瓮、罐、匏壶一类



组合是截然无涉的；但两类组合在两地曾互有交融，如高外撇足的“越式鼎”、吴越式铜剑等在江陵、长沙等地的楚墓中常见，而楚式的陶礼器组合也在东南大陆东周时期诸类型文化中普遍出现，是楚越文化交融的体现。<sup>[52]</sup>

2. 与濮僚系统的文化关系。东南与西南早期土著民族的关系是南方古史研究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说濮、越同，百濮即在百越，两者是同一族群的不同发展阶段，早期文献多言“濮”而不说“越”，如《尚书·牧誓》武王征商时有：“庸、蜀、羌、鬻、微、卢、彭、濮人”参加，有“濮”无“越”，并论先秦时期楚、巴、蜀、滇、夜郎境内的濮、夷、蛮、僚、獠等土著都属百越文化的范畴。<sup>[53]</sup>

多数学者认为濮、越及其先民明显有别，濮僚是西南民族。<sup>[54]</sup>前引《淮南子·坠形训》所记传说时代居西南的“结胸民，羽民”在其他史书中少谈到，“结胸民”疑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记“哀牢夷，皆穿胸”，“羽民”也不难联系西南早期铜鼓图像上的“羽人”，故均可推与“濮僚”先民有关。商末周初“濮人”一支兴起于江汉平原，即随武王征商八国之一的“濮人”，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考这八国“皆西方部族”，濮“在今湖北枝江县南”；后因楚的扩张，该濮西南迁，合入川、滇、黔高原的濮人其它支系为“百濮”，孔颖达疏《左传·文公十六年》曰：“濮为西南夷”，又疏引杜预《春秋释例》说：“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刘伯庄语“濮在楚西南”，又左思《蜀都赋》语“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汉晋以后，西南土著又多称“僚”、“夷僚”，都是百濮之后。

从考古学上看，东南地区与西南地区早期古文化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分区不平衡性，川滇西部金沙江洱海一带、四川盆地与川江沿岸、珠江与红河上游所在的滇东南区域的原始文化与东南地区古文化的关系程度是不等的。

在滇西北川西南间早期的宾川白羊村遗存约当龙山时代，石斧、石锛、石刀与稻作遗存共出，饰划线、瓦点线、绳纹的砂灰褐陶，多见圜底、平底的釜、罐、钵、支座；晚期的大墩子—礼州文化约当商代前后，砂陶平底器与少量圈足器共出，有桶形器、罐、壶、杯、碗等，没有圜底、三足器。<sup>[55]</sup>川滇西部与东南地区第二、三地带因具有某些相似的环境背景，都远离中原文明区，早期古文化存在相似的方面，如表现出文化滞后发展的状态和陶器上都缺乏三足、袋类器等，但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原始文化交流的体现。在陶器工艺、具体器类与组合上，金沙江流域的这些原始文化内涵与东南地区发展过程中的印纹陶文化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传统。

四川盆地与川江流域的原始文化常被概括为“巴蜀文化”，是巴、蜀及境内的濮僚等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存。巴蜀考古文化始于龙山时期，发展于夏商周时期，主要遗存有广汉三星堆、新都水观音、成都指挥街、忠县干井沟等，<sup>[56]</sup>石器有常形的斧、锛、凿等，不见东南地区常见的有肩、有段石器；典型陶器群为尖底或圜底或小平底的罐、壶、钵、杯、高把豆形器、袋足鬻、盃、鸟头把勺。除袋类器类似于黄河流域古代文化外，地域特色浓厚，与东南地区印纹陶文化也截然无关。但晚期出现的外撇足鼎、圜底甗形器，可能有东南古文化影响的痕迹。<sup>[57]</sup>巴蜀的铜器基本上为商周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巴蜀青铜兵器很有特色，青铜容器多仿造商周文化，看不出与东南文化的关系。

地处珠江和红河上游的滇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以晋宁石寨山贝丘为代表，从初步发现的陶器内涵看，有饰刻划波浪、山字形、叶脉、小方格纹的夹砂陶釜、罐、盆、钵和素面的泥质陶小碗、凹底碟等，与东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差别也是明显的。另一方面，这一地带的新石器文化的许多因素与东南古文化密切相关，如洞居与地面聚落共出，贝丘遗存与稻作遗存共出，常见有段石锛、有肩石斧、有肩石铲等工具，在邻近的贵州地区原始文化也有类似特点。<sup>[58]</sup>青铜文化大